



第二章  
推翻封建帝制，  
創建共和民國

一八九二——一九一一年

TIEG20



孫中山傳

宋文翰題

## 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

### 一、行醫與思索

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六歲的孫中山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是年九月，他應澳門鏡湖醫院的邀請，去到該院充當西醫師，掛牌行醫。十二月間，他改在澳門大街仁慈堂附近（後遷至草堆街八十四號，今為「大生匹頭」店）開設了一間中西醫藥局（西醫房），自己單獨行醫，打算用聽診器和手術刀來懸壺救世，造福人民，成了中國籍西醫師在澳門開業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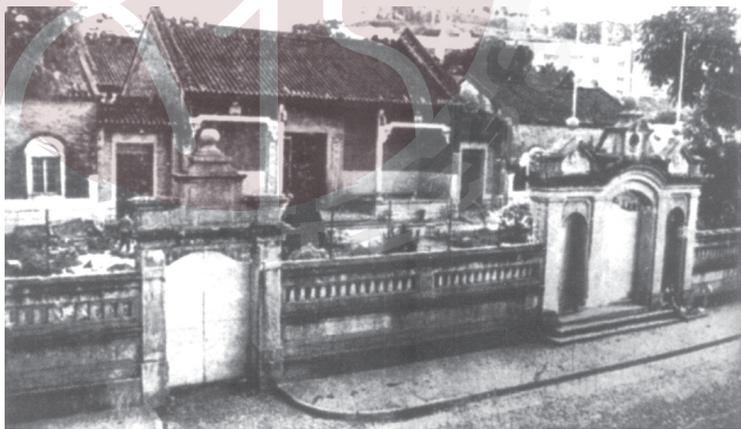
鏡湖醫院是中國人在澳門開設的最大的醫院，一向以中醫中藥為患者治病，但因孫中山學的是西醫，這家醫院主持人為此特開先例，允許。孫中山兼用西醫西藥為人診治疾病。孫中山擅長外科手術和治療肺病，他的醫德很好，以自己一貫認真負責的態度，待人親切，不避麻煩，熱情地為患者解除病痛。無論門診或出診，診費一律隨意而付，如有急診，不論貧富，有求必應；遇到一些窮人前來求醫，常常免費診治。他的醫術較高，藥到回春，加上每逢遇到疑難重症，他的老師康德黎博士必自香港乘船來澳門悉心指導，使許多病人經他細心診治，

解除病痛，恢復了健康；他還兩次把垂危的病人從死亡的邊緣上救回來，大得人們的讚譽。因此，他在澳門行醫「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就診者戶限為穿」。由於求治者紛至沓來，十分擁擠，他常常應接不暇。

一八九三年在澳門創刊的《鏡湖叢報》，曾兩次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情況。它詳細記述了孫中山當時的行醫地點、時間及業務範圍，尤其表彰他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具名刊登廣告者，均為當時澳門的知名人士。其廣告全文如下：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性情和厚，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

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但每月除贈醫外，尚有診症餘閒。在先生原不欲酌定醫金，過為計較，然而稱情致送，義所應然。今我同人，為之厘訂規條，著明刻候：每日由十點鐘起至十二點鐘止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復由一點鐘至三點



一八九二年秋，孫中山被澳門鏡湖醫院聘為西醫師，開始行醫濟世。圖為鏡湖醫院原貌。

鐘止在寫字樓候診，三點鐘以後出門就診，其所訂醫金，俱系減贈。他如未訂條款，要必審視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務祈相與有成，俾盡利物濟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條目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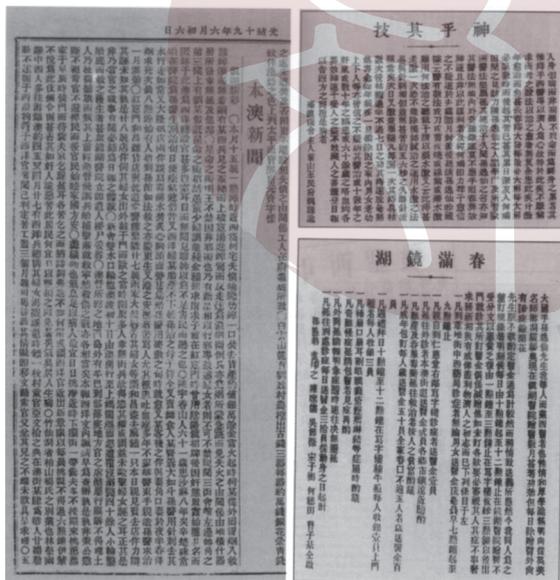
- 一、凡到草堆街中西藥局診症者，無論男女，送醫金二毫，晨早七點鐘起至九點鐘止。
- 二、凡親自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者，送醫金一元。
- 三、凡延往外診者，本澳街道送醫金二元，各鄉市鎮遠近隨酌。
- 四、凡難產及吞服毒藥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貧富酌議。
- 五、凡成年包訂，每人歲送醫金五十元；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歲送醫金百元。
- 六、凡遇禮拜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寫字樓種牛痘，每人收銀一元；上門種者，每人收銀三元。
- 七、凡補崩口、崩耳，割眼膜、癰瘡、癩瘤、淋結等症，屆時酌議。
- 八、凡奇難怪症，延請包醫者，見症再酌。
- 九、凡外間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 十、凡延往別處診症，每日送醫金三十元，從動身之日起計。

鄉愚弟盧焯之、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同啟。 1

但是，好景不長，孫中山在澳門僅僅一年左右時間，他的高明醫術和聲譽日隆，引起了原先在澳門行醫的一些葡萄牙人的妒忌和排擠。他們散佈了關於孫中山的不少流言蜚語，並藉口孫中山無葡國文憑，不得為葡人治病，還通知各藥房不得為中國醫生配方，進行多方刁難，阻止他繼續開業。孫中山被迫於一八九三年春憤然離開澳門，轉赴廣州行醫。

孫中山在廣州洗基（今十八甫南路）開設了東西藥局。他行醫贈診，使醫務之盛，一如澳門。不久，為適應醫務發展的需要，又在聖教書樓（今北京路白沙巷口）開設一處東西藥局的分診所；同時，還在香山石岐鎮與人合股開設東西藥局的支店。在廣州《中西日報》（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有一則《東西藥局啟事》的廣告，勾勒了他的醫務的輪廓：「在藥局贈診，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先生素以濟人利物為心，若有意外與婦難產、服毒藥症，報名危急，無論貧富俱可立時邀至，設法施救。」他很快獲得了人們的讚譽，「病家趨之若鶩」。

孫中山一面熱情為患者治病，施醫贈



澳門《鏡海叢報》讚頌孫中山醫德醫術的報導。

藥，拯救同胞；一面繼續「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多方聯絡，廣交朋友，考慮救國大計。在澳門的遭遇，使他親身感受到由於國家貧弱而遭受外國欺凌的屈辱和痛苦，更加真切地感到必須改革中國的現狀。另外，在行醫中接觸到一些官僚、士紳和商人，加深瞭解到清朝政府的黑暗和腐敗，也越來越認識到「醫術救人所濟有限」，若單憑自己的醫術，做一個好醫生，只能為一部分人治病，醫道縱然再高，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貧弱問題，也不能使廣大貧苦群眾真正擺脫苦難，因而「醫國」比「醫民」更重要。正如他常對要好的同學說：「醫生救人只幾命，反滿救人無量數，吾此生舍反滿莫屬矣！」所以，他不滿足於做一個治療人體疾病的良醫，更加關心的是國家民族的「痼疾」，便下決心通過其「醫人生涯」，放大醫生的職業去從事「醫國」的事業。

從此，孫中山由「醫人」走向「醫國」，開始了「借醫術」進行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動。

「醫國」如何入手呢？

這時期的孫中山，不再把醫務工作置於首要的地位，他「行醫日只一兩小時，而從事革命者，實七八小時」，主要精力已注入革命準備工作之中。正如孫中山自己所說，他「懸壺於



孫中山行醫時使用過的醫療器械。

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sup>2</sup>。

當時，孫中山除和大學時代一起鼓吹反清革命的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尤列等舊友密切來往外，又積極地物色反清志士，結識了一些具有愛國思想和對清朝不滿的新朋友，如書店經理王鬥山、基督教牧師王質甫、教師魏友琴、海軍軍官二程兄弟等人。其中程璧光系廣東水師廣丙艦管帶，畢業於福建水師學堂，曾被派赴英國學習過海軍業務；其弟程奎光為鎮濤艦管帶，也畢業於福建水師學堂。這部分人有一定社會地位，是一些對西方比較瞭解的近代知識分子。

孫中山和這些新朋舊友經常聚集在一起，在廣州聖教書樓後的禮拜堂及廣雅書局南園的抗風軒（今文德路省立中山圖書館南館內，原房子已不存在）談論時事和政治，謀求救國辦法，為實現理想做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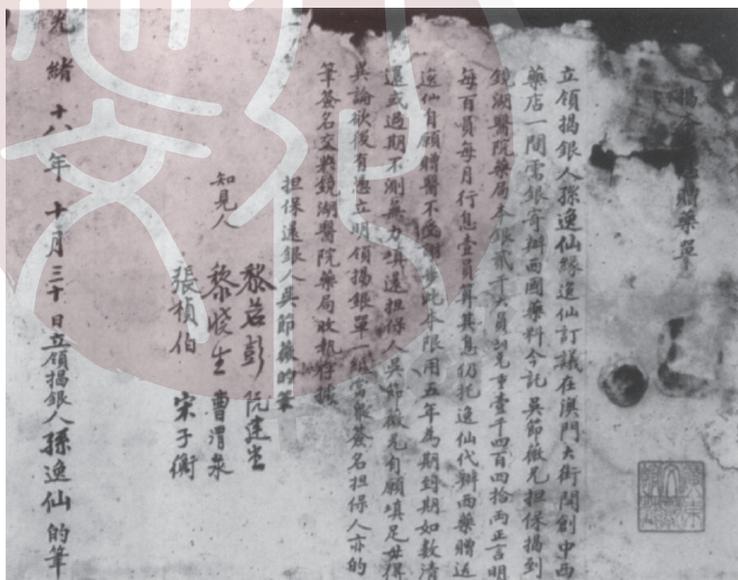


孫中山在澳門開辦的中西醫藥局舊址（位於澳門草堆街八十號）。

一八九三年冬初，孫中山邀集陸皓東、鄭士良、魏友琴、尤列和程耀辰、程璧光、程奎光三兄弟，聚會在抗風軒，在推心置腹的秘密議論中，曾醞釀要成立一個組織團體，以從事「醫國」活動。

他們選擇抗風軒密議時政，是有特別意義和便利條件的。抗風軒淵遠流長，歷為名人集社之所。在明初，翰林典籍孫賁、給事中王佐、翰林侍制黃哲、洛陽長史李德和監察御史趙介五人結社吟詠於此地，後廢為總鎮府花園。嘉靖年間，改建為三忠祠，祀宋信國公文天祥、丞相陸秀夫和越

國公張世傑。清光緒十三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創立廣雅書院，次年修葺三忠祠設為廣雅書局。尤列在廣雅書局附近的廣東輿圖書局任測繪生，與局員相熟，得借抗風軒以會友為名舉行密談。該處環境幽靜，有利於避開清吏的耳目。孫中山、鄭士良等人由仰慕前賢而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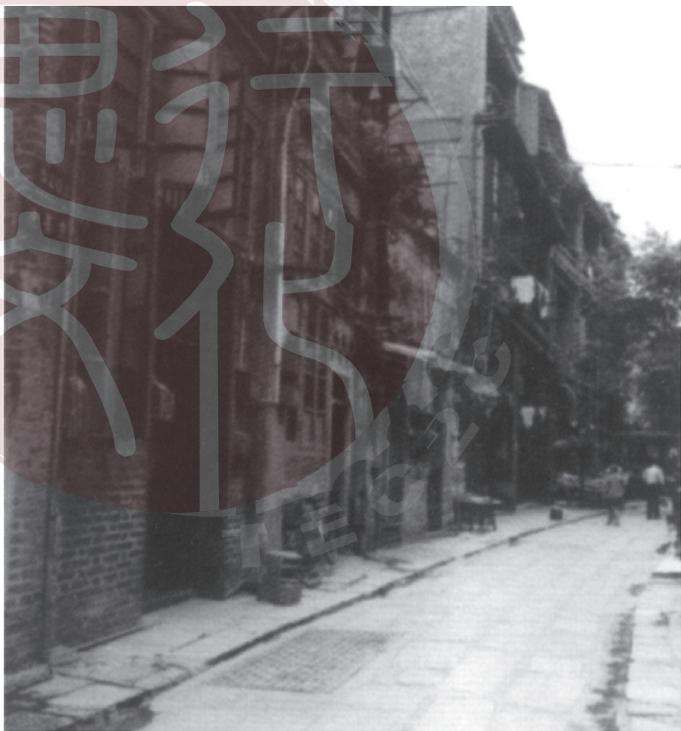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為拓展醫療事業，孫中山請吳節薇（楊鶴齡的七妹夫）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開辦中西藥局。圖為孫中山簽署的借款單。

法古人，在抗風軒談古論今，鞭撻時弊，抒發反對封建制度枷鎖的情感，議論成立政治組織，其寓意之大自然非同一般。

這次會議，由尤列主持，孫中山提議「宜先成立團體」，倡設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從皆贊成之」。後來因為參加人數很少，沒有形成具體組織，並無實際結果。這次議盟，也為後來興中會的建立和乙未廣州首義作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

儘管如此，但抗風軒的聚會和議盟，表明了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已趨於成熟，他已進入了結集同志、團聚力量、組織革命團體以促進和領導革命的新階段。這次議盟，也為後來興中會的建立和乙未廣州首義作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



因受葡籍醫生排擠，一八九三年秋，孫中山到廣州洗基開辦東西藥局。圖為該址今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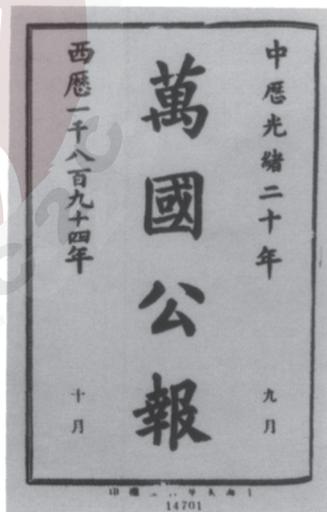
其實，孫中山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宗旨，實際上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而來。它體現不出近代民主革命歷史潮流的趨勢，更多地帶有反滿復漢的種族主義色彩。儘管近代中國一切腐敗落後的集中體現是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清政府，要解決民族獨立的根本問題必須首先推翻這個賣國政府；反清革命確實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但狹隘的種族主義畢竟不能成為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恢復漢人統治也不可能解決民族獨立的任務。孫中山雖然經過大學時代的政治思想陶冶，反對專制、主張憲政的民主主義思想成分有了很大增長，師法西方、建設良善政府也已有所考慮，但舊傳統與新思想相互交織在一起，以致在凝聚同志、結合團體、樹立宗旨時，仍然模仿古代人來興政圖強和使用傳統的語言。所以，他當時倡議成立的興中會即使形成具體組織，也只能算作一個種族革命的團體。

## 二、上書李鴻章

一八九四年，當時二十八歲的孫中山雖然已經有了一些革命思想，但是還沒有成長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與發表過不少鼓吹改良主義主張論文的何啟早有結交，又不斷和改良主義者鄭觀應就時局問題通信交換意見，思想上受到了他們的一些影響；加上國內改良主義思潮盛極一時，所以，孫中山與當時的某些先進人物一樣，對清朝政府抱著幻想，寄希望於統治階級上層某些人物。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探求、試驗並向統治者提出改革救國主張方面。

早在一八九〇年，孫中山還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就曾寫信給已退職的香山縣籍洋務派官僚鄭藻如，主張效法西方國家，進行改良，提出「興農會以倡革農桑業」、「立會設局以禁絕鴉片」和「興學會設學校。以普及教育」三項具體意見，建議先在香山縣倡行，然後逐漸推廣到全國各地。此外，他在一八九一年前後寫的《農功》一文，也是其改良主義作品之一。這篇文章完全沒有涉及變革農業中的封建生產關係問題，只是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改良中國的農業生產，反映了孫中山在不觸動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前提下要求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願望。到了一八九四年夏天，熱情奔放的孫中山又特地尋找門路，通過種種關係去求見當時在清政府裡掌握軍、政、外交大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期望著通過建議改革政治以謀求民富國強。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八九四年春，孫中山回鄉，在故居書房起草《上李鴻章書》。圖為上海《萬國公報》刊登的《上李傅相書》（部分）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一月底，正在廣州開東西藥局診所的孫中山突然不知去向了，失蹤了。診所裡的人，急切地寫信給香港孫中山的好友陳少白，告急說藥房中的現金已所剩無幾，開銷都成大問題了，卻不見了店主的影子。陳少白立即回到廣州找了幾天，但仍杳無音訊。又過了幾天，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大家都非常焦急。

原來，在春寒料峭、淫雨紛飛的一個早晨，孫中山丟下他的藥房，靜悄悄地一個人回故鄉翠亨村的家裡，關起門來，埋頭去起草《上李鴻章書》去了。

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中憶述說，到了第十六天，孫中山忽然跑回來了，「手裡拿著很大一卷像檔的東西，他見了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這些事不要去管他了。』」說著把手裡的文稿打開，給了陳少白，商量如何修改。經陳少白「稍微修改一下」後，便研究怎樣尋找門路去求見李鴻章。

要會晤李鴻章，絕非是輕而易舉的事。孫中山幾經周折，商請了曾經做過澳門海防同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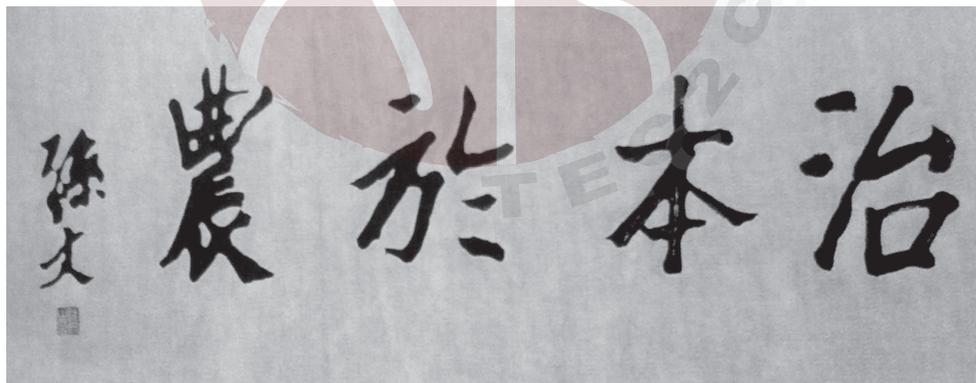


一八九四年夏，孫中山乘船經上海赴天津求見李鴻章，陸皓東陪同孫中山前往，圖為陸皓東十二歲照。

時已辭官在廣州閒居的魏恒替他寫了去見盛宙懷的推薦信。魏恒在信中要求盛宙懷出面轉請他的堂兄盛宣懷向李鴻章推薦孫中山。信上說，孫中山「人極純謹，精熟歐洲掌故，政治、語言、文字均皆精通，並善中西醫術。……現擬遠遊京師，然後仍作歐洲之遊」。

孫中山攜帶著陳情書和推薦信，在摯友陸皓東的陪同下，於同年春夏間從廣州北上，前往上海。在上海，他除了如願以償地得到盛宙懷的介紹之外，還專訪他的前輩鄭觀應，得到鄭觀應的幫助，並由鄭觀應介紹結識了另一著名改良主義者、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為孫中山疏通投見李鴻章的門路。王韜寫信給與李鴻章關係密切的幕僚羅豐祿，請求幫助「玉成其志」；鄭觀應則直接修函盛宣懷，稱孫中山「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要求盛宣懷介紹孫中山去見李鴻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蘊」。

《上書李鴻章》共八千餘字。孫中山主張以西方資



孫中山特別重視富國富民的振興衣業工作。此橫幅是他一九二一年給內政部農務局秘書同鄉李祿超的題詞。

產階級為楷模，採用先進科學技術以發展工農業生產，使工商業擺脫封建束縛；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達到國家獨立富強的目的。強調優先發展農業，認為「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需」，建議開設農師學堂、舉辦農藝博覽會、派人出洋考察、開墾荒地、集商經營等，以促進農牧業生產。要求「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認為「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並就這四件事的內涵分別作出規定：「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還逐項地詳細加以論證。它反映著孫中山關於富強國家、發展生產和建立一個資本主義中國的初步構想，是一個在教育、農業、工礦業、商業、交通運輸業等方面學習西方使中國現代化的方案。總之，信的基本內容，就是希望統治階級上層由上而下地實行、引進資本主義的改良措施，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他認為清政府如採納他的主張，只要做到上述



孫中山與陸皓東途經上海時與宋嘉樹結識，遂成至交。圖為宋嘉樹。

方面，就會「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

應該說，孫中山的這些要求，是他早期學習西方的一大成果，也反映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表達了正在不斷成長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求解除封建主義束縛，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主張。

孫中山為上書言事而閉門奮筆疾書，之後又四處奔波進行活動，尋找疏通投見李鴻章的門徑，表明他對這次上書抱有很大的期望，充滿信心地認為「李鴻章在當時還可算識時務的大員」，較之那些一味守舊的頑固派官僚顯得要開明些，既握有重權又是漢人，如果他能夠接納自己的主張，促使清政府重新振作，使中國現狀有所改觀，這樣「辦起來，也未嘗不可以挽救當時的中國」。正是抱著這種心情，他興沖沖地又從上海趕赴天津，去求見李鴻章。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六月下旬，孫中山偕陸皓東抵達天津，寄寓在法國租界佛滿樓客棧，隨即通過盛宣懷、羅豐祿等人，將自己的上書轉呈李鴻章。

由於打通了關節，得到有力人物的介紹，孫中山的陳情書遞到了李鴻章手裡。但是，李鴻章的態度極為冷淡，他藉口軍務繁忙，拒絕接見他們，只隨便地傳話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其時中日戰爭即將爆發，李鴻章在蘆台督師）對上書的主張未加理睬。

嚴峻的現實，使抱著滿腔熱情的孫中山徹底失望。他試圖通過上書請願來促使清政府奮起的活動失敗了。

### 三、創立興中會

津門上書的失敗，對孫中山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促使他打消了對清政府尚存的一些幻想。

這年夏秋間，悶悶不樂的孫中山同陸皓東又遊歷了京津等地，他目睹清政府的種種腐敗齷齪現象「更倍於廣州」，深感清朝統治者積弊已深，無可救藥，從而更醒悟到上書請願和平方法無濟於事，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須用根本改造來代替局部改革。於是，他就毅然決定轉上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道路。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在這次戰爭中，中國的一些愛國官兵英勇作戰，寧死不屈。可是，清朝政府腐朽無能，不敢堅決抵抗，戰爭遭到慘重失敗，引起全國震動，人民激憤。這時，孫中山再次感到國家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進一步認識到「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熾熱的革命救國意念，促使他「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sup>3</sup>，應該立即行動起來，只有革命才是解決中國危機的唯一出路。

也就在這一年的十月，孫中山懷著革命的遠大抱負，從上海乘輪船經日本，再度到自己少年時讀書的地方——檀香山，去聯絡華僑，宣傳革命思想，進行組織革命的活動，為策動反清革命做準備。

當時，檀香山共有華僑兩萬多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因為在家鄉生活不下去，被迫背井離

鄉，漂洋過海的。他們多靠種田地、辟蔗園、經營商業為生計。其中有少數人靠辛勤勞動的積聚所得，慢慢發跡成為資本家。孫中山在孫眉的幫助下，在當地華僑中積極開展革命的宣傳工作，獲得了經營商業的宋居仁、夏百子等少數人的回應。多數僑胞雖然也怨憤由於清政府的腐敗，使其在國外備受殖民主義者的欺壓，但卻安於現狀，把孫中山的反清宣傳視為「作亂謀反言論」，害怕招致「破家滅族」之禍，根本不理睬他。就是親友故舊，也多掩耳驚走，「奔避不遑」。

所以，起初贊同他主張的人寥寥無幾，有的甚至嘲諷他是癡人說夢。孫中山後來把這種情況描述為「風氣未開，人心錮塞」。但是這種遭遇，並沒有使孫中山氣餒、頹喪。由於他堅韌不拔地努力活動，奔走逾月，終於得到了一些愛國僑胞和香山籍同鄉的同情並願意接受所宣傳的反清革命思想。同年十一月，他在華僑中動員了二十多名關懷祖國命運的人（主

要是經營小商店和小農場的華僑，另有少數工人、醫生、會黨等），創立了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興中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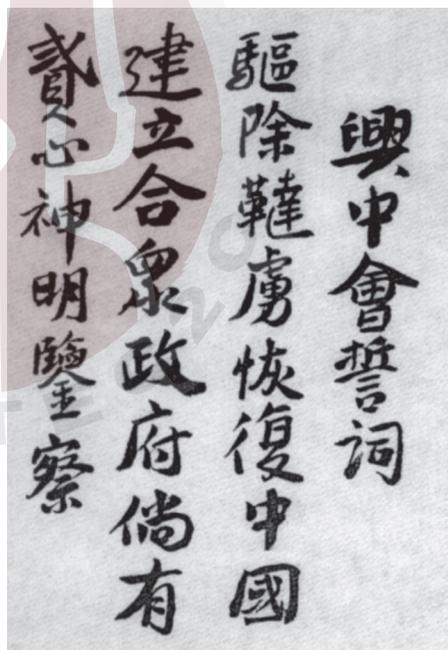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火奴魯魯美商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寓所舉行的成立會議上，規定以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孫眉農場。

「振興中華，維持國體」為宗旨，這二十多人舉起右手跟著孫中山向天宣誓，參加組織。誓詞是：「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sup>4</sup> 這個誓詞中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朝政府、建立一個以美利堅合眾國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體的理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綱領，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思想的初步萌芽。

在成立大會通過的孫中山親自起草的《興中會章程》中，以強烈的愛國激情，揭露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指出當時的險惡局勢：「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而清政府「上則因循苟且，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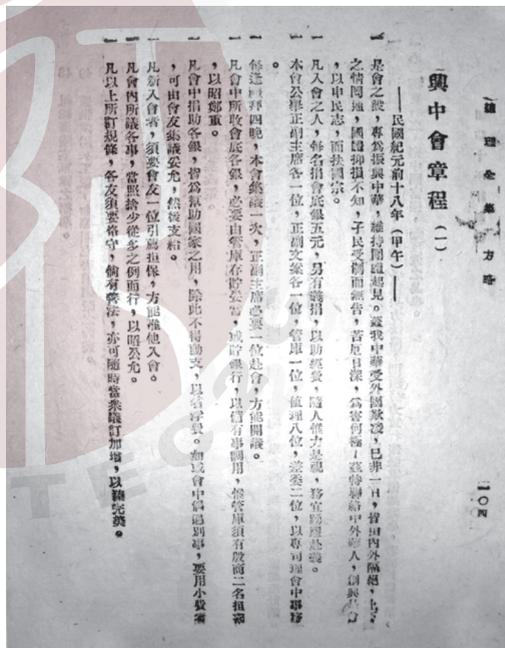
興中會誓詞。

4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六年版，第二十六頁。

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造成「辱國喪師，……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強烈地譴責了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禍國殃民的罪行，發出了聯絡一切有志救國的中外華人群起共同救國的呼籲，其目的就是為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振興中華」的口號，便是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第一次提出來的。此外，《章程》還就經費、組織機構、議事制度以及吸收新會員等問題作了一些規定。

在成立大會上，還分別選出劉祥（火奴魯魯永和泰雜貨店司理）和何寬為檀香山興中會的正副主席，程蔚南（商人）和許直臣（教員）為正副文案，黃華恢（商號司帳）為管庫，李昌（政府機關及《檀山新報》譯員）、鄭金（商人、移民局譯員）等八人為值理，並決定會址設在「華人消防所」二樓。

興中會是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它的創建，發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



孫中山在其主持制訂的《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首次提出「振興中華」口號。圖為《興中會章程》。

信號；它成立後的反清活動為革命播下了火種，從而也宣告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活動的開端。

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又派人到檀香山各埠進行擴展組織、發展會員的工作。宋居仁、李昌到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孫眉為主席的興中會分會；孫眉又到百衣（Paia），建立了以鄧蔭南為主席的興中會分會。這年冬天和次年間的數月內，陸續有一些華僑入會。在有名籍可稽的一百二十九名會員中，華僑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小農畜牧場主、銀行家等）占百分之六十二點五；自由職業者（公務員、教員、新聞記者、技師等）占百分之十一點七；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點八；他們均屬廣東省籍，其中香山縣人占百分之五十六點三。他們之中有一些會黨分子，如鄧蔭南、鐘木賢等。

不過，檀香山興中會畢竟是中國民主革命派建立的最早的組織，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完全新型的革命團體。



興中會經常活動的場所——華僑李昌的住宅。

它的創建發出了民主革命的第一個信號，為反清革命活動播下了火種，也宣告中國近代民主革命活動的開端；它還表明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組織形式上的初步形成，從此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進入了正軌時期。

當然，無論它的章程（並沒有公開提出革命的主張），還是它的組織成員狀況（帶有狹隘的地域性，缺乏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都明顯地帶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徵，存在很大的弱點，因而它並沒有能成爲一個堅強的革命團體，沒有真正形成中國民主革命派的戰鬥核心。當孫中山離開檀香山後，它的活動幾乎立刻停止，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也未能發揮重要作用。

興中會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產物。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市場和勞力市場；另一方面又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活躍，使一部分人掌握了一定數量可以轉化爲資本的貨幣。這就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條件和可能。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廣州、上海二地創辦的企業爲起點，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開始緩慢地發展起來。一八九四年，全國有名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達一百〇七家，內有資本可計者六十七家，共有資本六百二十八萬九千〇三十五元。它們主要是輕工業部門，包括紡織、繅絲、軋花、榨油、造紙、火柴、機器、製藥等業。儘管這些企業資金不足，規模較小，技術設備落後，但它卻意味著一個進步階級的產生和新的鬥爭的到來。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初步發展，其政治力量也有明顯的增長。孫中山就是這個階級的代表。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

和民族危機日趨緊迫下，中國各階層人民反抗外國侵略勢力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的鬥爭也日益加劇，以孫中山為代表所發動的民主革命運動隨之開始興起。興中會便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由資產階級革命分子所組成的革命團體。

## 四、首次武裝起義——乙未廣州之役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一月下旬，孫中山從檀香山趕赴香港，準備利用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而民心憤懣的有利時機，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檀香山興中會的少數激進分子，如鄧蔭南、宋居仁等人，自願隨同孫中山回港準備參加起義。孫中山一回到香港，便約集過去志趣相投的摯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等，又聯繫和物色了同氣相求的一些人士，商議如何發動起義的問題。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香港中環士丹唐街十三號成立了興中會總機關。為避人耳目，對外用「乾亨行」<sup>5</sup>名義作掩護。其骨幹成員，有陳少白、陸皓東、鄭士良，以及香港的楊衢雲、謝纘泰等人。他們都是思想比較激進的反清志士，形成了一個戰鬥的領導核心。他們修訂了《興中會章程》，明顯加強了革命色彩。它激烈抨擊清政府的腐敗殘暴，指出當時的「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國，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強調發動更廣泛的群

5 「乾亨」一語，取自《易經》，寓「乾無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主義」。意為「物極必反，漢族已有否極泰來之象」。

眾，要求將救國主張「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為一心，合遐邇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遺艱」，一起參加救國的革命行動。這樣，它就大大高超於檀香山的興中會一籌了。

之後，孫中山偕同陸皓東、鄭士良等人到了廣州，在雙門底王家祠雲岡別墅成立了興中會組織，陸續入會者達數百人之多。

孫中山早在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便已開始引導會員籌集軍費，並召集宋居仁、夏百子等二十餘人組織兵操隊，聘請一個丹麥人為教官，進行軍事訓練，準備回國進行反清武裝起義。待香港興中會一建立，他便著手組織武裝起義，同大家籌畫如何去襲取廣州。正在這個時候，清政府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五日與日本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使日本侵佔了臺灣和澎湖列島，勒索了兩億多兩白銀的賠款；還允許日本資本家直接來中國開辦工廠。全國人民聞訊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許多人撰寫文章和詩歌，反對割讓臺灣，要求廢除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聲討清朝政府賣國罪行。孫中山更加激憤，認為時機已到，不能再等了。他立即籌備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政府，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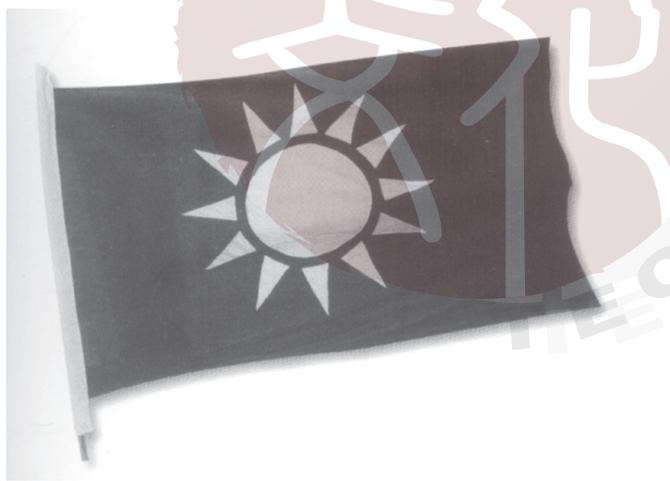


孫眉全力支持弟弟的反清活動，成為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堅強後盾。圖為孫眉照。

為發動起義，孫中山和戰友陸皓東、楊衢雲、鄭士良等辛勤奔走，往來於港、粵之間策劃部署一切，在廣州設立「農學會」作為掩護起義的機關，又在香港同興中會領導成員多次開會，討論起義計畫和起義後的具體政策。經過商議，決定由孫中山駐廣州親自擔任軍務，直接指揮起義，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隨同前往，協助行動；楊衢雲、黃詠商等人則留在香港，負責籌措經費和購運軍械等工作，擔任後方接應和人力、物力的補給。

為了增強起義成功的把握，孫中山還積極活動，爭取外援。他派謝纘泰與《德臣西報》主筆黎德（T. H. Reid）、《士蔑西報》主筆鄧肯（C. Duncon）聯繫，爭取這兩家英文報紙的支持；又與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恒次郎接觸，明確表示自己的革命目標，要求給予支援，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斷然拒絕。幻想得到帝國主義的援助是不切實際的，這是孫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個很大的弱點，對他直到晚年才有清醒的認識。

經過半年的積極活動，購買了六百支新式手槍，聯絡並組織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和廣



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由陸皓東設計，孫中山親繪的起義軍軍旗（其圖案後被中國國民黨黨旗、黨徽和中華民國國旗所採用）。

東省各地的會黨、「綠林」、遊勇及防營、水師隊伍，先後建立秘密機關數十處，決定於當年十月二十六日（舊曆九月初九），利用重陽節回鄉群眾來省城掃墓的機會，炸毀兩廣總督署，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規定了參加起義用紅布纏臂作標誌，以「除暴安良」為口號，陸皓東又設計了一種青天白日旗以代替清王朝的黃龍旗，並制定了奪取廣州後揮師北上，直搗京師，推翻清王朝的計畫。到十月二十五日晚，各地的「綠林」首領、軍隊首領等，多已集中到廣州等候命令，他們摩拳擦掌，準備著投入戰鬥。

不料，就在這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

孫中山接到楊衢雲從香港發來的電報，通知原定由他帶領的充當起義主力的三千名敢死隊員和一部分槍支彈藥，不能按期到達廣州。這樣一來，就打亂了起義計畫。正當他們採取緊急措施以應變時，又由於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右）、鄭士良（左）乘船經香港、臺灣流亡日本。圖為當時三人合影。

謀事不密，加上參加起義的朱淇向清政府告密，起義計畫事先被清政府察覺，同時香港殖民當局也暗中向清政府的兩廣總督通報了興中會的活動情況。於是，兩廣總督譚鐘麟便急調軍隊加強廣州防衛，並大舉出動，封閉革命機關，四處搜捕起義人員。這次起義尚未正式發動就被查獲破壞了。陸皓東及會黨首領朱貴全、丘四等被捕後英勇就義，另有四十餘人被捕入獄。這是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廣州起義，實際上是一種單純軍事冒險的行動。它不是紮根於廣大群眾之中，而是依靠外面輸入隊伍襲擊大城市。當時廣州清軍有一萬多人，興中會用幾千名臨時集結並沒有經過扎實組織和宣傳工作的隊伍舉行起義，又加之內部步調不一和謀事不密，以致起義失敗。

儘管廣州起義未及發難就告失敗，但在近代中國革命鬥爭的史冊上，仍然有著重要意義。它是「孫中山戰鬥事業的起點」，是孫中山及興中會領導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它是民主革命派以暴力革命形式宣告一種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的開始。烈士們的鮮血為中國近代的民主革命史譜寫了壯烈的首頁，從此中國近代革命民主派正式揭舉起武裝革命的旗幟，清王朝的喪鐘因此而敲響，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開始為人所注目。

廣州起義反映了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們還遠不是成熟的革命家，這次暴力嘗試的失敗和上次上書和平改良的失敗一樣，都只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動逐漸發展成熟過程中的一個環節。